

中外手工造纸技术研究的述评与前瞻

张 洁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具有丰富的历史研究价值、文化遗产价值和科技文明价值。中外学者对中国古代造纸技术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视角:一是从科学技术史和文明传播史的角度对造纸史进行研究;二是从地方社会史和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对造纸技术进行研究;三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本土实践研究。本文从文献资料和研究动态两个方面回顾和反思中外手工造纸技术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认为中外学者对手工造纸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转型是不同时期人们对造纸技术的认识转变的结果。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造纸技术通过走“乡村手工业”发展道路以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和乡民增收,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手工造纸技术;造纸研究;乡村手工业;技术传承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5-0104-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512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重要载体。造纸术作为文化遗产、科学技术、文明标志和手工业技术具有丰富的历史研究价值、文化遗产价值和科技文明价值,对其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外学者对造纸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其一,从中外科技史、文明传播史和纸史的史学视角展开研究;其二,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考古学家深入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展开实地调研,进行有关民间造纸技术的技术民族志研究;其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造纸技术的传承保护实践研究。

一、科技史、文明传播史视野下的造纸史研究

从中外科技交流史和文明传播史的视角研究造纸术,大多探讨三个问题:造纸术起源发明的历史考证^[1];造纸术东学西渐的文明传播史;关于造纸原料、造纸技术、造纸经济等方面的科技史探讨^[2]。

(一)东学西渐:文明传播技术

在造纸术的起源方面,我国学者杨巨中著《中国古代造纸史渊源》^[1]、钱存训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3]15-17}、潘吉星著《中外科技交流史论》^{[2]642-643}及《中外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2]642-643},学者们

收稿日期:2020-03-05

作者简介:张洁(1985—),女,山西太原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技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乡村社会发展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手工业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研究”(19CSH062),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十四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研究”(2020-GMC-034)。

对造纸术的起源、发明者、造纸原料、中外交流史有着详尽的梳理^[2]。

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认为造纸术是促进西方文明现代化的重要要素,对现代文明的推动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14 世纪初,《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马可·波罗(Marco Polo)曾报道了大汗帝国纸币的广泛流通,以及在祭祀时所用的焚烧纸冥器^{[4]382-388}。据载,“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初见中国纸钞票,大为激赏”^[4]。费夫贺(Lucien)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认为,“造纸术在 12 世纪从中国、阿拉伯西传欧洲,直到 14 世纪晚期,纸张才在欧洲广泛应用。如果没有纸张的催生,印刷术也发明不起来”^{[5]2}。可见,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结盟促进了人类思想和知识的传播。

随着中国造纸术在西方的广泛传播,西方汉学家相继展开纸史的研究,包括法国的儒莲(Stanislas Julien)、德裔的夏德(Friederich Hirth)、劳弗(Bethhold Laufer)以及美国的卡特(Thomas F. Carter, 1882 ~ 1925)^{[3]15-17}。18 世纪,曾作为副使来华的英国爵士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著《英王派遣使节谒见中国皇帝实录》,其中详尽记载了中国的多种造纸原料,“在中国,他们用大麻纤维、稻草和树皮可以造纸”^{[6]333-334}。中国造纸原料的“秘密”为欧洲摆脱用破布造纸从而导致造价高昂的困境提供了思路和启迪。

18 ~ 19 世纪,国外文学著作从侧面记录了中国造纸技术传播至欧洲从而对欧洲造纸业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代表作是法国现实主义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幻想破灭》(汉译本书名《幻灭》)^{[7]97}。小说从侧面叙述了一个纸张发明家理想的幻灭过程,反映了欧洲造纸人是如何受到中国造纸术的启发从而改进本国的造纸技术的史实。19 世纪以来,欧洲国家造纸业采用纤维原料造纸,以便能够节约成本,促进纸张二次循环,重复利用,增加市场效益,缓解当时法国大革命以后破布原料供给短缺,价格上涨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市场危机问题。

费夫贺和马尔坦回顾了“纸的进程”,从 12 世纪经商人与阿拉伯人的交易而出现于意大利市场的“一种新的羊皮”,到 13 世纪早期的用于誊抄公共法案的“棉草纸”;14 世纪早期以亚麻布作为造纸原料出现于欧洲的“破布”,中期阿拉伯人开始使用动物胶取代植物胶制作的“棉帛纸”,再到 14 世纪下半叶纸张彻底取代“羊皮纸和棉帛”;14 世纪末欧洲各国都开始使用纸张书写^{[5]2-3}。江晓原在《我们国家的技术与发明》一书中考证了东汉蔡伦纸从 3 ~ 4 世纪取代简帛的过程,并梳理了中国古代造纸术向世界各国传播的历史:4 世纪传向朝鲜、高丽,西晋时期传播到越南,公元 610 年传入日本。唐时通过被阿拉伯俘虏的唐朝造纸匠人传到阿拉伯,之后从阿拉伯传到欧洲,13 世纪传到意大利,14 世纪又传至法国,17 世纪各国有了自己的造纸业^{[8]67-68}。

据此,中外学者是在造纸术东学西渐的文化传播史中开始研究造纸术。主要从造纸术的传播、原料和变迁过程反映中国造纸术对于欧洲经济 and 世界文明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部分的研究较为成熟,彰显了作为“文明传播技术”的造纸术在中西方文明交流和传播中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二) 科技文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造纸术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明也受到中外科技史学者和海外汉学家的关注。19 世纪,国际汉学家们已关注明代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19 世纪的法国汉学家儒莲翻译《天工开物》。潘吉星认为,“其他外文译著都是根据儒莲译文再转译的”^{[2]85}。儒莲 1832 年开始翻译《天工开物·丹青》篇的论制墨技术,1840 年正式开始翻译《天工开物·杀青》篇的造纸技术,题为“中国人造纸方法概述:译自中国书《天工开物》”,刊于《科学院学报》1940 年卷 10^{[2]86}。1846 年该文转载于巴黎《东方评论》,题为“中国造纸工业”^{[2]67}。法国汉学家对中国造纸科技的翻译和传播促进了中外科技文明的交流。

英国汉学家、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一书,其中涉及造纸技术的内容载于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的《纸与印刷》。李约瑟开辟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先河^[9]。钱存训翻译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技史》中《纸和印刷》分册,中译本题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纸

与印刷》^[3]。1995年,此书题目为《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造纸与印刷》在中国台北出版^[3]。之后,这本著作以题为《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于1995年再版,该书详尽地探讨了中国造纸术的起源和发展,并讨论了造纸技术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3]82-113}。

综上观之,在16~20世纪期间,中外科技史学家、汉学家、文化史学家致力于造纸术研究,他们著书立说、翻译译作、编撰文献、考证历史,从文化史、文明传播史、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角度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多采用历史文献法和材料考证法,鲜见实地参与观察的方法。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为“文献考证研究”,即“书斋式的文本田野”。

进入20世纪,中外手工业造纸技术的研究转向了一个从“书斋走向田野”“从历史到现实”,从近代走向现代、从国家向地方、从宏观叙事向中观地方社会考察为特点的研究转型,从探讨纸张发明和交流的纵向历时演进过程研究,转向探讨技术如何促进和影响社会发展的横向关联。

二、地方社会史、人类学视野下的造纸技术研究

地方社会史和人类学视野下的造纸研究多关注技术造物(纸)背后的人如何参与地方社会的建构,造纸技术如何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纸张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文化的变迁。

(一) 社会技术:地方社会史视野下的造纸研究

国外学者们倾向于从“他者的眼光”来看中国“本土的”造纸术,研究中国“地方社会”的手工造纸技术,即从乡村社会史、地方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手工造纸技术,“以小见大”地洞悉中国工业和农业、手工业的关系、中国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说明植根于乡土社会基础之上的乡村手工造纸业和地方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与海外汉学研究者(“他者”)自身学术积淀、早期的研究兴趣、居住环境和猎奇心理有关。20世纪,国际汉学家关注乡村社会史视野下的手工造纸术如何影响地方社会关系,思考技术对乡村社会建构的影响。

20世纪以来,海外汉学家与中国西部(四川)地区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纷纷进入四川腹地进行实地调研。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现代史专业副教授艾约博(Jacob Eyferth)对四川夹江手工竹纸进行人类学考察,论著中译版题为《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变迁史》^{[10]63-64}。作者注重研究中国乡村手工造纸在技术与“去技术化”、衰退与革新进程中如何嵌入在国家权力的编织中并且重建社会组织关系,巧妙应用实地社会调研方法和历史追溯法,全面考察夹江槽户(农民)的多重身份和造纸技术卷入的社会配置因素,最终得出了造纸匠人(造纸槽户)是在(国家政策、市场机制和农村经济)等多因素影响下导致了地方社会变迁的结论。艾约博认为,“乡村手工造纸技艺不会被现代西方技术完全取代,传统技艺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和乡村社会半工半农的农民性质,传统手工业依然发展和持续。”^{[10]63}

国内学者则注重从技术和纸张的“物质性”出发,研究纸张的流动对市场、社会组织、国家权力等方面的影响,是一种关于物与地方政治建构关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路径。研究思路是以“物”为切点审视地方社会组织关系,包括权力关系。肖坤冰、杨正文注重探索物质(纸)流动背后的造纸人群在纸张贸易圈中的横向流动和在大清帝国政治空间结构中的纵向流动,通过“物”(纸)流动的表象,透视隐藏于“物”(纸)的资源争夺背后的国家权力的“地方化”意义,从而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做出历史性的解释^{[11]13-18}。文章注重探讨清帝国与地方政治在争夺技艺(造纸)资源过程的相互博弈、互动的张力和过程。笔者认为,该文更多地关注到物质表象背后的国家权力、地方化政治及人群在区域历史中的社会关系建构,是典型的人类学研究视角。

(二) 想象技术:世界视角下的纸媒研究

人类学者不仅仅关注造纸术本身,也开始转向关注作为技术造物的纸在商品化流动中如何参与形塑现代民族世界这一“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12]3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印刷资本主义”能够迅速的增加人对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12]33}。安德森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时间上的一致,第二个根源就是“报纸和书籍的出版”^{[12]30}。印刷术的出现,使得“报纸”以商品的形式渗透到日常民众的生活之中,创造了共同的权力语言,形成“想象的共同体”^{[12]45}。然而这一概念在历史层面非常不清晰,中国的非官方书籍和雕版木刻用的纸张,都是通过手工业家庭作坊将书籍和纸张流通在市场中,这种流通并未形成真正的“印刷资本主义”,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并未进入盈利性的扩大化市场。“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说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共谋技术不仅参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形成,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安德森认为,“新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结盟,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迅速地创造出为数不多的新的阅读群众,并且同时对他们进行政治或宗教目的的动员”^{[12]40}。印刷借助纸张商品作为中介,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们连结在一起,变成了“想象的共同体”^{[12]30-40}。以上论述均说明了无论是造纸技术还是作为知识传播媒介的纸张及纸的流通都是催生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形成的主要力量之一。

综上所述,人类学家关注造纸技术如何影响西方现代工业化的进程、纸张如何参与催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技术如何推动世界科技的发展与文明的进程。技术通过身体感官、分工协作去建构社会,技术作为一种实践方式、行动方式、认知方式和理解方式都影响和改变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的运作和社会秩序。概言之,造纸技术是现代世界文化和地方文化重构和再造的“助产士”和“催化剂”。这部分的既有研究都为研究我国当下现实中国乡村手工业造纸技术如何贡献于地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建构乡村社会秩序、振兴乡村手工业、传承技术文化有理论意义和启发意义。

(三) 功能技术:作为乡村发展动力的造纸技术研究

我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从功能视角分析造纸技术的功能和作用,考察造纸技术对社会的组织和建构过程。学者们多从手工造纸技术的文化功能出发,重在分析造纸技术如何在地方社会中发挥功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组织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

“功能”与“需求”是文化功能主义的关键词,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注重研究文化的功能。把文化看作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人工体系^{[13]23}。费孝通认为,文化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是体,文化是用,体用分明”^{[13]23}。人们为了生活的需求而创造纷繁复杂的世界。功能主义将文化视作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整体,功能就是对人有用处,而文化是一个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牵连的系统。在20世纪30~50年代,费孝通,张之毅赴云南三个村庄(易村、禄村和玉村)展开调研。其中,易村以手工造纸为主要文化特色,调研结束后,费孝通著《云南三村》。张之毅则在《易村手工业》一文中通过对云南易村的土法造纸工艺流程的介绍,得出了造纸技艺是农业派生的一种技艺的结论,阐述了乡村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社会关联^[14]。

易村因费孝通曾经的研究而受到后辈青年研究者的关注。云南民族大学陈绍瑞的硕士论文《易村手工造纸的兴衰与社会变迁》(2015)对云南易村进行重访研究。文章以易村手工造纸由盛转衰的脉络为主线进行分析,探索易村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并提出了易村手工业存在的“逆经济”问题^[15]。该回访研究注重探索乡村手工造纸业如何影响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变迁。

综上,社会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手工造纸研究更多地关注作为社会建构中的技术、“想象的共同技术”以及发挥文化功能的“发展型技术”的研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不仅仅看到造纸技术是一种文明符号和物化实在,也看到了技术背后的“人-社会-文化”的系统关系和功能。概言之,人类学、社会史视

野下的造纸技术研究将造纸术作为“社会建构技术”“乡村手工业技术”“媒介传播技术”发挥着自身独特功能,将人、技术(物质)、社会、文化嵌入到一个地方社会中加以考察,从而挖掘出技术背后的人和社会、人与文化、人与地方政治、人与经济的内在结构关系,是一种见人、见物,有局部、有整体、有发展、有变迁、有结构的动态变迁研究。

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土实践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学者主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技术人类学方面对手工造纸技术进行研究。

(一)民族技术:民族地区手工造纸研究

民族地区造纸研究包括藏族、瑶族、壮族、纳西族、彝族以及苗族等地区的民族造纸技艺的研究。

潘吉星较早考察了藏族造纸术,探索了西藏造纸的产区、产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以及纸张的功能。西藏造纸主要集中于拉萨附近的纸坊村,多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世代承袭。较大的生产中心集中于印经院附近,因寺院经营,资金较为雄厚,雇佣很多造纸工人,所造之纸主要供当地印刷佛经之用^{[16]479}。藏族地区造纸原料为破麻布、木本韧皮纤维、草本根茎纤维,故纸等^{[16]478}。李晓岑的《四川德格县和西藏尼木县藏族手工造纸调查》一文叙述了德格县和尼木县两地藏族手工纸的历史源流、工艺流程、工具原料及文化特征,指出藏纸的制作工艺不同于中国内地的抄纸法,而是属于印巴次大陆和东南亚常见的浇纸法造纸^[17]。

此外,潘吉星还考证了云南彝族的手工造纸,认为彝族造纸技术起源于历史上的南诏国(732-902)时期。自汉唐以降,汉族人包括汉人工匠迁往彝族地区,将中原技术带到云南。由此,彝族人发展农业和各类手工业技术。元代彝文著作迅速增加,彝族手工造纸业开始发展,所造纸张为皮纸,用彝族文字撰写^{[16]491}。潘吉星分析阐述纳西造纸技术与纳西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历史关系,推断“纳西造纸是产生于纳西纸写成的《东巴经》之后的明清时期”^{[16]488}。潘吉星在1965年考证了纳西族用东巴文和哥八文撰写的《东巴经》用纸,主要原料是桑科类植物制成的皮纸。而对于纳西造纸的工具,潘吉星推断是竹帘抄造而非固定纸模抄造^{[16]488-489}。和虹在《浅谈纳西东巴纸造纸技术》一文中探讨纳西族的民族历史文化和东巴造纸技术的渊源,并预测了东巴造纸技术为当地社会带来的商业旅游、工艺品开发等方面的市场前景^[18]。

李晓岑在《云南少数民族造纸技术的调研和研究》一文中比较分析了云南纳西族、傣族、哈尼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造纸技术的历史源流、造纸原料、造纸工具、造纸流程,说明了不同民族造纸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和共同性^[19]。此外,广西民族大学贝维静的硕士论文《滇桂民族手工造纸技术多样性研究》,研究传统手工造纸“技术多元”与“文化多元”的特点,关注技术多样性和文化土壤之间休戚共生的关系,认为机器纸张无法替代手工造纸所具有的文化土壤,说明了技术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的共生关系^[20]。

木基元通过考察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芒团村的傣族原始造纸技术,认为傣族芒团纸是当地人手写抄经的主要材料^[21]。莫力发现了手工造纸与当地人的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凸显手工造纸嵌入在地方宗教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功能,为手工造纸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潘吉星认为,瑶族普遍有手工造纸,就地取材生产皮纸,属于家庭手工业,“不脱离农业生产,多是一家一户,或几家合伙,男女一齐动手”^{[16]486}。瑶族的手工纸除用于自给自足以外,多以赶集的形式在集市上交换、易物。“瑶族造纸最早起源于14世纪”^{[16]487}。潘吉星认为,造纸术是在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壮族地区。其时中原战乱频繁,大批工匠和文人学士来到岭南避乱,技师工匠在此带徒授艺,

手工造纸技术由此传到广西壮族地区^{[16]489}。

李晓岑探讨两类造纸技术和社会民族文化历史源流的关系,认为浇纸法是从东汉传入到新疆,唐代传入西藏,其非蔡伦系造纸法,而抄纸法才是蔡伦系造纸法^[22]。张和平、杨孝斌、朱灿梅从技术工艺学的视角对石桥手工造纸工艺进行考察,认为石桥古法造纸技术属于抄纸法,并探讨添加纸药在造纸工艺中的作用——使料浆悬浮并均匀地溶解于水中,进而分离纸张^{[23]123-126}。李晓岑、王珊通过对十个少数民族造纸工艺的民族调查材料的分析,说明了民族志调研法应用于鉴别古代民族造纸技术的重要作用,认为选择民族调查法有助于对造纸技术和复原古代的技术有特别突出的意义^[24]。韦丹芳、赵小军在《广西贡川造纸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广西壮族纱纸技术进行研究,详尽分析了纱纸工艺所建构的当地的社会关系,以及传统造纸工艺技术的文化传承价值^{[25]27-28}。

综上,技术人类学注重研究少数民族地区造纸和民族文化源流的关系、不同民族地区纸张功能、造纸原料、造纸方法和造纸工艺。研究重在分析技术,轻于分析技术背后的人、文化和社会的关系;研究处于“见物多于见人”的处境,未指出当地手工造纸的传承困境与市场危机,未从文化保护的角度给予对策建议,实际应用价值较小。

(二) 遗产技术:作为“非遗”文化的遗产技术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化大生产的盛行,机器化造纸对传统手工造纸形成巨大冲击,古代造纸技术陷入市场狭窄、后继乏人的传承困境。2009年,我国将古法手工制作技艺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明了国家层面对作为非遗文化遗产的古代手工造纸技术的重视。

造纸术不光是“技术”,也是“技艺”;不仅是传统的文化,也是改良的民间艺术。研究者从各自专业所擅长的研究视角切入,研究地方的、民间的、民族的造纸技艺,并提出保护意见和对策建议。我国民俗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相继进入不同的村寨对各地手工造纸技艺展开调研,分析导致技艺衰退的各类原因(市场、文化、生态),并给出对策建议,研究呈现出“多学科、跨部门”合作研究的趋势。

首先是分析衰退原因,提出保护对策的研究。张建世、杨正文将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传承困境分为“衰退类”和“变异类”,前者是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减少造成,而后者是技艺发生改变^{[26]20-28}。田茂旺对贵州白水河村的手工造纸技术由兴盛向衰退的状态进行分析,归纳出导致衰退的原因包括自然灾害与现代化冲击等原因,提出“引入当地技术因子、开发性保护以及政府给予适当补偿等建议策略”^[27]。张建世在《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造纸遗产的保护初探》中对丹寨石桥村手工造纸的市场状况、纸张用途、生产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导致手工造纸衰退的根本原因是现代工业的冲击,提出适度补贴、收储制度等建议^{[28]16-21}。

其次是分析市场原因,提出“生产性保护”原则的研究。刘文良、叶贞琴通过对石桥手工造纸的历史溯源、造纸工艺和纸品特色进行描述和分析,指出在目前的市场危机中,手工造纸存在市场占有率低、产业链比较原始、品牌效应不够明显等问题,提出传承保护手工造纸应该拓展市场、实现生态型保护的建议^{[29]131-135}。张娟、张晓松认为针对石桥村古法手工造纸存在的市场占有率低、传承人缺失、纸张实用价值低、品牌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应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之上进行“生产性保护”^{[30]1-4}。吕品田认为,“生产性保护”就是要在生产中保护和发展^{[31]5}。在生产中保护就能让技能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有市场需要的技能的生产才能源源不断,没有需求的技能生产无法真正被传承和保护下来。此类研究强调手工造纸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市场生态环境(生产产业链),主张进行生产性保护,拓展市场渠道,强调技术的“市场”和“生产”的重要作用。

再次,分析技术的文化空间、知识传递、生态环境等综合原因,将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过程、工艺美术学知识系统来进行研究。谢亚平从人文生态、生产工具与生产空间的角度研究夹江造纸工艺,认为

造纸工具是“手的延伸,是技术的凝结”。夹江造纸世代相传,自成体系,造纸工具和生产空间是手工匠人不断劳动实践的结果。对手工造纸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应该从文化空间(工具、原料、生产者、市场)的复杂共同体进行维护,不能忽略手工技术和文化系统的共生关系,重视生态自然和社会人文在整体中所发挥的作用^{[32] 94-97}。许婧将手工造纸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研究了连城宣纸造纸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关系。研究表明,连城手工造纸技术是客家文化、历史环境和政府政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33] 53-57}。此外,手工造纸技艺的传承依赖于知识的传递。谢亚平认为,四川夹江造纸技艺文化体系作为知识的传递有三种途径,第一是通过直觉或者传授的身体知识,第二种是与当地社会活动实践有关的地方话语,是隐形的技术知识;第三种是通过分工协作而产生的共享知识^[34]。

(三) 发展与扶贫技术:从遗产保护到创造价值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学者们对于手工造纸技术的研究逐渐从单一的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研究转向“非遗+扶贫”相结合的研究,寻求非遗技艺的保护、传承和扶贫实践之间的有效衔接机制。目前,关注乡村造纸技术和扶贫或者乡村振兴的研究还不多。但是展望未来,研究乡村手工业技术如何贡献于乡村经济发展,通过“非遗+技术+扶贫+合作社”等模式进行生产合作,如何助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这部分的研究将会成为研究趋势和热点。在这层意义上,手工造纸技术从作为“非遗”文化的国家文化“符号技术”转变成为带动乡村手工业产业兴旺,促进乡村脱贫的“实用技术”,这是一种从技术研究向文化研究再到强调技术的实用功能的研究趋势,是对于技术的再定义,使古代技术变成文化符号再将文化符号转化为实用技术。在此意义上,手工造纸技术是一种“发展的技术”,研究者应该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乡村造纸手工业技术,将造纸视为是产业、路径、渠道,是富民手段,既可以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产业兴旺,又可以践行文化传承实践的实用主义研究。

四、述评与前瞻

我国传统造纸技术具有丰富的历史研究价值、文化遗产价值和科技文明价值。纸张本身也具有实用功能、书写传播功能、宗教祭祀功能、文化交流功能和审美艺术功能。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造纸技术以及纸的理解发生了转型。人们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也在不断的发生转变,研究者从注重造纸的文明和文化的历时纵向研究转向造纸技术嵌入社会、文化、经济和人群组织建构的横向关系研究,再到随着机器大工业文明的冲击,古代造纸技术生产能力逐渐式微,研究者转向了对手工造纸技术传承保护的策略研究。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手工技术可以实现“创造性转化”,造纸术作为科技文明技术、文化遗产技术、非遗保护实践技术和“乡村发展的技术”可以发挥多重价值和功能——审美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人们开始转向了作为一种“发展的技术”如何贡献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和乡村文化的复兴和再造的研究路径中来。

作为古代文明和古代科学技术的造纸术,中外学者们主要从中外科技史、文明传播史和纸史的学科视野研究造纸术的发明、传播的过程,以及中国造纸术对世界文明和经济的影响;人类学、社会史视野下的造纸研究注重研究技术如何组织社会生产、技术如何参与社会建构、技术背后的人的社会关系,关注手工业造纸技术如何改变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与村落关系、地方信仰,参与与外界市场和国家力量的互动;技术民族志研究注重研究造纸技术的流程、工具和工艺——纸张的文化、宗教、经济作用对该民族地区的影响,包括传统工艺和文化如何影响当地的生产生活、地方习俗、传承理念,以及如何创造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国内学者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土化实践关注手工造纸技艺传承,不只是一种视角,而是结合多重视角和多维面向,集中探讨手工技艺、物我关系、主体间关系、地方和中央、传统-现代功能转型、多元文化交融和地方乡村手工业的发展问题和非遗文化技艺保护问题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中外学者从注重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到注重技术考古研究、民族志调研研究再到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参与观察法、深入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口述史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的过程,方法上是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结合。在研究范围上,国内研究者们不仅仅将视野聚焦某一“点”,而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进行“变动式”“追踪式”研究。从原来静态的书斋式的文献研究转向“到民间去”的实地研究,从历时研究到过程研究,从理论研究上升到如何将科技史、文化史、民族学理论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研究。展望未来,中外学者对于我国造纸技术的研究将技术与社会、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产业兴旺等方面结合起来,逐渐强化技术的“实用价值”,弱化技术的“符号价值”,回归到一种发挥手工造纸的经济功能的研究中去。文化遗产的领域近年来呈现出跨学科、合力共谋、交融探讨、互通有无的局面。来自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史等各学科的学者、专家都从自己专业的学科本位和研究范式出发对传统手工造纸技术及文化遗产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杨巨中. 中国古代造纸史渊源[M]. 西安:三秦出版社出版,2011.
- [2] 潘吉星. 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3] 钱存训. 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4] 沙海昂. 马可·波罗行记[M]. 冯承宪译.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5] 费夫贺,马尔坦. 印刷书的诞生[M]. 李鸿志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6] 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纪实[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7] 巴尔扎克. 幻灭[M]. 傅雷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8] 江晓原. 我们的国家的技术与发明[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 [9]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导论)[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0] 艾约博. 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M]. 韩巍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 [11] 肖坤冰,杨正文. 纸行天下:清朝夹江地区的手工造纸业与地方政治[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9(10).
- [1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吴坚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13] 谢中立. 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费孝通:另类的功能主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14] 费孝通,张之毅. 云南三村[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 [15] 陈绍瑞. 易村手工造纸的兴衰与社会变迁[D]. 云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5.
- [16] 潘吉星,卢嘉锡.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 [17] 李晓琴. 四川德格县和西藏尼木县藏族手工造纸调查[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7(2).
- [18] 和虹. 浅谈纳西东巴纸造纸技术[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1(5).
- [19] 朱霞,李晓岑. 云南少数民族造纸技术的调研和研究[J]. 民族研究. 1999(1).
- [20] 贝维静. 滇桂民族手工造纸技术多样性研究[D]. 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10.
- [21] 木基元. 孟定傣族原始造纸的民族学考察[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8(2).
- [22] 李晓岑. 浇纸法与抄纸法——中国大陆保存的两种不同造纸技术体系[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1(5).
- [23] 张和平,杨孝斌,朱灿梅. 贵州石桥苗族古法造纸工艺调查与分析[J]. 凯里学院学报. 2016(6).
- [24] 李晓岑,王珊. 民族调查在考古学调查中的应用——以少数民族手工造纸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 [25] 徐杰舜. 从人出发再回到人——访广西民族大学韦丹芳博士[J]. 民族论坛. 2010(8).
- [26] 张建世,杨正文.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的保护[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3).
- [27] 田茂旺. 贵州白水河传统手工造纸保护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9(3)

- [28] 张建世.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造纸遗产的保护初探[J]. 中华文化论坛. 2011(3).
- [29] 刘文良, 叶贞琴. 贵州石桥古法造纸的传承与发展[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6(4).
- [30] 张娟, 张晓松. 贵州民族手工艺生产性保护研究——以石桥古法造纸为例[J]. 怀化学院学报. 2014(7).
- [31] 吕品田. 在生产中保护和发展——谈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保护[J]. 美术观察. 2009(7).
- [32] 谢亚平. “器”以载艺——四川夹江手工造纸技艺工具和生产空间价值研究[J]. 装饰. 2014(9).
- [33] 许婧. 手工造纸与客家族群文化研究——以“连城宣纸”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7).
- [34] 谢亚平. 隐蔽的技艺——论四川夹江手工造纸技艺传承中知识传递的三种途径[J]. 民艺. 2018(1).

Review and Prospect of Handmade Papermaking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Zhang Ji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Papermaking is one of 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in ancient China, which has rich historical research value,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valu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existing researches on ancient China's handmade paper technolog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aper-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second, the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y of paper-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social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ird, the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hand-made paper as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papermaking can promote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farmers' income by taking the path of "rural handicraft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help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handmade papermaking technology; papermaking research; review and prospect; rural handicraft industry; technology inheritance

[责任编辑:刘力]